

井房子

张猛

几十年前一个冬天的早晨，我从爷爷奶奶唠嗑声中醒来，那时，整个世界都笼罩在一片蓝色烟雾里。

我爷爷叼着小烟袋，我奶奶端着大烟袋，一边说话，一边喷云吐雾，朦胧中好似神仙。一股浓烈刺鼻的旱烟从他们身体绵绵不绝冒出来，升腾，弥散，我撤下盖住头脸的棉被，懵懵懂懂听出好像有什么事情发生。

我爷爷说，村里新建的自来水房需要放水的人，可以住在那，每年给600块钱，冬天还给三吨煤，这在当时的祁家窝棚是不小的诱惑。我爷爷毛遂自荐，村委会顺利通过。也许是因为我爷爷上过前线抬过担架，当过村支书，也许是因为他有个精神病儿子。总之，获得这个差事让他脸上有了久违的笑容。

搬出三间老屋还意味着可以给儿女们腾出更大空间。一半留给要结婚的老叔，另一半留给患精神病的三叔。十里八村都知道祁家窝棚有个“三疯子”。我亲眼见过我三叔吃马粪，喝汽油，还踢过我奶奶，打折过我爷爷三根肋骨。对他们来说，能离疯儿子远点是个不错的选择。

井房子在祁家窝棚东北角。第一家有三间最气派的大砖房，那是村主任家。搬家那天，我跟大人走进一个没有围墙的院子，只有两间孤零零砖房静默在冰天雪地中，陌生，荒凉。我不会想到，多年以后这里会成为我魂牵梦绕的地方。

水罐如巨人般矗立在东屋，上顶棚，下陷地，所以，关于井房子的记忆有一部分是凹下去的。水罐、电机都卧在坑里，旁边是缓缓而起疙疙瘩瘩的土坡。我爷爷雄心勃勃地在上边搭炉子，建锅台，东北角还用木头钉了一座鸡架……好像一切都重新开始了。

无论春夏秋冬，水罐浑身都湿漉漉的，锈迹斑斑，好像一个人干了很多活，走了很远的路。水罐下面是块平坦的水泥地，总汪着一层浅浅的水，鸡有时会来喝几口水，拉两泼尿，再信步离开，从不觉得自己做坏事。

西屋住人。一铺火炕贴着北墙，横贯东西，能睡七八口。上面铺过炕席也铺过酱紫色地革。睡觉时，我紧挨我奶奶，尤其看了有恐怖镜头的电影或电视剧，挨得更紧了。我整个人都缩进被窝，

憋得满头大汗，这时我奶奶就掀开被，把湿漉漉的我拽出来。在井房子我从小学睡到初中，直到高中住校才离开，放假又迫不及待回来。

我是吃我奶奶的饭长大的。在没有闹钟更没手机的年代，不知有多少个黎明，我奶奶醒了就不敢再睡，也不开灯，摸黑坐在我旁边抽烟。一边抽，一边前后摇晃，像循环往复的钟摆。只抽到天光乍现屋里蓝汪汪一片才下厨房。我是闻着我奶奶的烟味儿长大的，我不得不感激她，养活我同时也给我注入了强大的抗体，使我今生今世对抽烟始终保持古老的敌意。

井房子的水一天放三遍，每次半小时。放水时，墙上电闸一合，屋里立刻发出轰鸣，连说话声都被淹没了。如果电压低，电机就嗡嗡叫，这时马上就要拉闸，慢了，电机就烧了。

不放水有人找，漏水了也有人找。我爷爷就从炕上起来，把水罐旁边三个阀门中的一个关掉。那时，我爷爷好像救星，头上放出异样的光。正常放水时间之外很少有人要水，除了东院村主任家。有时，村主任老婆扒着墙头扯嗓子喊：“九叔，给放点水！”有时，要水的是他家孩子：“九爷，放水！”那口气就像命令。这时我爷爷就不吱声，也懒得起来。常常是我奶奶一边高声答应，一边急忙走到东屋合闸，机器闷雷一样响起，我爷爷躺在炕上还要骂几句。

春夏耕种时节，也有开车来拉水浇地的。四轮车上躺着大铁罐，用塑料管接水。那时院子里就热闹起来，鸡飞狗叫，马达轰鸣。我有时跳到车上，看着不断升起的水面，摸着铁罐渗出来的细密水珠，感受来自大地深处遥远的凉意。

三叔从来没有进过井房子，直到后来被民政局送到精神病院。有什么事儿，他只在外边喊，招呼我爷爷就喊老头儿，招呼我奶奶就喊老太太。仿佛他和我们之间隔着一条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。多年以后，读到卡尔维诺《树上的男爵》，我就想起了我三叔。

后来，村里又在别处打了新井，房子很小，没法住人。那时我爷爷奶奶已经离开人世，井房子卖给个人，一座高大陌生的砖房矗立在眼前，院墙高耸，铁门紧闭，将我和井房子永远隔开了。我走在平坦坚硬的水泥路上，四处张望，像个迷路的孩子。

我知道，我们都成了对方的彼岸。我和爷爷奶奶，三叔，和井房子。在岁月的河流中，总有一些东西消逝而去，也总有一些东西沉淀下来，无论相距多么遥远，即使看不见，也会变成另一种形式存在，在我们心中屹立不倒。



野渡 李海波 摄

刺痛

更求金巴

初入汉语系那年，霜降已过，秋风裹着北方的冷钻进教学楼的缝隙，像冬日秃鹭抖落的寒羽，落在摊开的论文稿上都带着凉。我攥着笔对着选题“文化认同”发呆，笔尖生涩得像冻僵的溪流，写下的论点零散如风中飘乱的经幡——那时才懂，自己不过是“黑帐篷天窗处数星星的牧人，寒夜中的星星也会直打哆嗦”，连用汉语搭建学术逻辑的门径都摸不到。

论文初稿提交没几天，在走廊撞见同班的他。他扫过我手里的修改稿，突然用他家乡的方言嗤笑：“就这水平还写论文？你妈没教过你什么叫量力而行？”我听不懂方言里的恶意，只看见他脸上的轻蔑，我竟像只摇尾的藏獒般傻傻地憨笑。直到后来我懂了他的方言后，那句带着母亲的嘲讽像冰锥扎进心里——母亲在我心里是冈仁波齐的雪，干净得容不得半点亵渎；是玛旁雍错的圣水，澄澈得碰不得一丝污名。骨子里的劲一下子炸开来，我像头野性的牦牛般冲上去，攥着他的胳膊把话砸在他脸上，没讲什么道理，只把草原上最直白的血性摊给他看。他挣开手攥着书包匆匆走了，只留下我在原地，胸口因愤怒而发颤。

后来论文果然没及格，导师在评语里写“逻辑松散，缺乏深度”。我把论文稿摊在图书馆的桌子上，决心要争口气。那些日子，我泡在图书馆熬到闭馆，走廊的灯从亮到灭，没钱买咖啡提神，就反复接图书馆的水喝，冰凉的水顺着喉咙往下滑，像家乡的雪水，虽没有酥油茶的热，却能让昏沉的脑子清醒几分。写不下去时，指尖划过稿纸上凌乱的字迹，再想起他的嘲讽、想起自己当初憨笑的模样，就像有根刺扎在心里，逼着我不肯认输。我翻看相关的资料，直到修改后的论文里，论点终于像唐卡般规整，论据也扎实得能站住脚。

大专两年，我再没和他说过一句话，毕业时也只是在人群里远远

见过一面。真正的开悟是在多年后某个深夜，我整理旧物翻出当年的论文稿，红笔批注与修改痕迹重叠在纸上，突然就懂了——当年他那句刻薄的话，哪里是恶意，分明是渡我的舟。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，他是我至世中的一位上师，以怒目金刚的模样出现，用最尖锐的言语当金刚杵，一锥子敲醒了我沉溺的愚昧，逼我从混沌里站起来，看清自己的不足。这份顿悟来得猝不及防，心里的感激却翻涌得厉害，再想起当年的争执，只剩庆幸。

后来我在同学群里找到他的联系方式，拨通电话时，声音都带着些微颤抖。他的声音传来，聊起那场误会，他已然淡忘。我握着话筒，眼眶忽然发热，语气里满是真诚的感恩：“当年太冲动，更要谢谢你，若不是你那句话，我不会逼自己往前走——你不知道，你是帮我醒过来的人。”他在电话那头愣了很久，才轻声说：“没想到会这样，你现在好就好。”

如今每到寺庙祈福，我都会在桌前点一盏酥油灯，为他祈福。那火苗轻轻跳动，像把当年的愤怒与懵懂都揉成了感恩的光。风拂过窗棂，带着远处经幡的响动，倒似在诵经，为这份跨越岁月的“渡化”祈福。后来我偶尔会去一些学校讲座，我常和学生说：生命里那些让你疼的“刺”，或许是上师化身送来的警醒。像偶遇到的冰雹，砸在身上疼，却能让人在疼痛里清醒；像金刚杵的立锥，扎在心上痛，却能戳破愚昧的壳，让人长出更坚韧的力量。

现在再回头看，当年没及格的论文、那句刺耳的嘲讽、自己傻傻愣愣的模样，都成了生命里珍贵的印记。我终于能静下心来，在灯下梳理学术与人生，才懂得最好的渡化从不是温柔的抚慰，有时是带着棱角的敲打，是怒目金刚的警醒，而我们要做的，是在敲打里觉醒，在警醒里成长，然后带着感恩，继续往前走。

